

小巷管家团“组团作战”，小院议事厅“协商共治”，在北京市东城区，越来越多的居民走出家门，共同参与到社区自治管理之中，共同创造——

胡同里的幸福

阅读提示

在民政部公布的全国县以上行政区划代码表上，北京市东城区代码为“110101”，位列首位。该区位于北京市中心，属于首都功能核心区，41.84平方公里

的土地上有常住居民79.4万人，分属177个社区。北京市东城区在社会治理方面的探索和创新之举，值得其他城市的建成区域借鉴。

本报记者 赵昂

这里有光鲜亮丽的商厦，王府井大街历史悠久；这里也是北京市文物古迹最为集中的区域，连片胡同青砖绿瓦，紫禁夕晖掩映其中；作为城市建成区，这里还有老旧小区400余个，楼栋总数超过1200栋。

近日，北京电视台播出了10集纪录片，讲述北京市东城区如何用“绣花功夫”做好城市管理，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水平，探索具有北京风范的社区居民自治管理模式，建设和谐宜居的首善之区，纪录片的名字就叫《胡同里的幸福》。

归属感和认同感

“这是19号楼北侧，停车位的铁板翘起来了。”北京市东城区龙潭街道光明社区小巷管家宋雅军，在社区巡访时发现问题，连忙联系停车管理员。今年62岁的她，是龙潭街道最早的一批小巷管家。2017年，北京市东城区将“街巷长”延伸，设立了小巷管家，让辖区单位职工和居民认领街巷，参与管理，当时58岁的宋雅军想着，作为社区的一员，要为社区居民做点事，就报了名。

就这样，宋雅军一直干了下来，4年时光荏苒，小巷管家从龙潭街道推广到东城区全区，最终推广至北京全市，小巷管家本身，也升格成“小巷管家团”。截至去年4月，东城区已经在全区17个街道和3个地区共招募小巷管家2064名，实现全区178条主要大街，1005条背街小巷全覆盖，从劝导不文明行

为，到纠正占道停车、拆除私搭乱建，作为居民的一员，小巷管家深入参与到街巷治理和环境建设。

升级成“管家团”，用光明社区居委会副主任申晓艳的话来说，就是从过去的“单打独斗”变成“组团作战”。小巷管家在日常巡访中发现问题及时上报，居民也形成了有困难、有问题找“管家”的习惯，小巷管家已经处理事件超过37万件。

“我在东城出生，这里有古都的风韵，也有历史与现代的碰撞。”北京广播电视台《这里是北京》主编张晓达告诉《工人日报》记者。历史积淀让这里的居民更加从容自信，对城市乡愁有着自己的见解，对社区也有着更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。

“我们社区分为4个网格，楼房29栋、两个平房院，有4000多户1.1万人口，社区内有161个单位。”东花市街道东花市南里社区书记杨立新，想起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居民们的守望相助。社区党员、在职党员、志愿者组成了晚间巡查队，利用晚上遛弯的时间询问小区内带着行李箱的人和拎包客，第一时间敲开返京人员的家门。社区里成立了7支志愿者队伍，共计300多名志愿者参与其中，很多退役老兵冲在防控第一线。

社区的志愿者们值守门岗和公共区域，并进行消杀工作，筒子楼里没有电梯，老党员和退役老兵每天上下午爬上爬下两次消杀不辞辛苦，社区青年突击队服务境外返京居家隔离居民807户，1700多人，通过双向承诺服务温暖了群众的心，有效切断了传播危险。

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，东城社工总计敲开了31万户家门，服务居家观察的8万名居民。

大家一起来协商

在前门街道草厂四条的小院议事厅负责人李彩仙看来，越来越多的居民打开了家门，不再关着门只过自家日子，而是共同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。草厂四条44号院里，挂着“小院议事厅”的牌匾，草厂社区的小院议事厅是2012年成立的，至今已有9个年头，居民在生活中产生的问题、建议、诉求都来议一议。“上传下达，把居民的意见征求上来，及时传达给社区党委，社区党委将问题上报街道，问题处理后，我们再反馈给居民。”李彩仙说。

这样的议事厅，不仅让居民有了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，也提高了社区治理和服务的精细化水平，小到院子里的晾衣空间如何设置，大到“煤改电”，架空线入地，厕所改造，这些都是小院议事厅的协商内容。天气冷了，垃圾分类桶站面临值守难，草厂四条的小院议事厅开议了，群策群力一起想办法。大家决定进一步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知识，从源头指导好如何分类，到了晚上，居民自发熬制的姜丝可乐，送到了还在值守的志愿者们手中。

“居民没有什么大事，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儿，但这些事也得有人管，您说不是吗？”一位居民说。基层社区面对的事情不大，但往往却是居民的操心事、烦心事和揪心事，协商起来并不容易，往往涉及诸多方面。

社区的老人说，马路太宽，人行道绿灯时间太短过不去，杨立新自己掐着表试着走，“真过不去”。作为区人大代表，她建议延长人行道绿灯，但是，车行道堵车怎么办？后来，协商之下，人行道绿灯适度延长，路中间多了一个安全岛，一次走不过去，分两次走。

永定门外街道杨家园社区，一共有17栋楼，“我在这里住了10多年，以前物业也没有，产权也复杂。”老居民谈起小区的过去，安装电梯，一个楼门“恨不得有八种意见”。有的居民说，如果需要交钱我就不装，“就当爬楼梯锻炼了。”杨家园社区的对口协助单位，是区工商联，工商联请来了法律顾问，推动社区建立了4

个物管区域，之后的工作就好推进了。

引入多方资源

杨家园社区的情况并非孤例，东城区58个委办局对口协助老旧小区问题较大的58个社区，各委办局发挥各自优势，帮助各小区建立一整套物业管理机制。精治、共治、法治，实现了社区与主管部门的无缝对接。

建设好社区，需要引入多方资源，引入专业力量。无法在家中如厕，是平房区居民面临的问题，李静思是朝阳门内南小街205号院“美丽院落”改造的设计者之一，院落改造过程中针对居民的如厕需求，设计安装了一个净化槽，“净化槽可以对居民家中排出的污物进行微生物处理，排出来的水质接近中水标准。”李静思说。净化槽安装那天，小院里的居民兴高采烈像过节一样，“我们终于可以买马桶了。”

李静思表示，这样的净化槽适用于无法进行大规模市政改造的老旧小区。东城区城管委负责人表示，“美丽院落”改造一院一策，在保持千年老城风貌的同时，也让居民能过上便捷的现代生活。

辖区单位的资源，也能够有效用于服务居民。和平里街道和平里三区居民王雅薇，全家开心的一件事就是有了停车的地方。作为老旧小区，和平里社区设计之初并没有预留多少停车空间，王雅薇家上有两位老人，下有两个孩子，“非常需要用车”。经过协调，她的车可以停在雍和航星科技园的停车场，离家步行只要四分钟。“头一期50个车位，每个月500元，车位不固定，但保证有地方停。”和平里社区书记王京朝说，社区内单位提供的共享车位，缓解了居民停车难。而在雍和航星科技园总经理李志伟看来，这是一件社区和企业双赢的好事，企业在尽到社会责任的同时，也盘活了存量资产。通过这样的方式，东城区全区增加了1112个共享车位。

“每一件小事，其实对居民来说都是大事。每件小事都有人张罗有人管，这就是宜居，这就是胡同里的幸福。”有居民如是说。



在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南里社区的“花缘礼乐公众学堂”，社区的老人们正在学习书法，其乐融融。本报记者 赵昂摄

G 民声

莫让你的“教育焦虑”成了别人的“智商税”

苏墨

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的笔者，几乎每天都在被各种教育培训机构的广告狂轰滥炸，“都两岁了，还没有开始学英语，您快要错过敏感期了。”“三岁再不学编程，孩子就被时代抛弃了。”既然是广告，自然要制造紧迫感，“您来，我们培养您的孩子；您不来，我们培养您孩子的竞争对手”……

尚不熟悉母语规则的小宝宝，能否系统性学习与母语全然不同的第二语言？少儿编程队还在学数数的小孩子究竟有多大效果？其实，这些问题，教育专家已经有权威回答，小孩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，而知识的学习是需要系统性和规律性的，超越年龄拔苗助长不仅效果堪忧，有时反受其害。

说白了，有的广告，真的就是“智商税”。我原以为“久经考场”、警惕性高、辨别能力强的当代青年人，对这些广告应该能够做到“刀枪不入”。但当我加入若干“宝妈群”“闲置物品转群”后，发现事实上，这些群归根结底都是“拼娃群”。家长们的“教育焦虑”比推销广告的话来得还夸张——不用商家“忽悠”，就能“自投罗网”，争着抢着被“割韭菜”，交纳“智商税”。

上补课班只是“沉迷鸡娃，不能自拔”的家长们，日常花费的一个小头儿。“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”，从怀胎十月就开始购置胎教仪器，价格还很贵；生下来就开始想办法、提前交费占“坑好”的幼儿园；为了给孩子良好的学习氛围，做“当代孟母”，选小区、帮孩子筛选接对象；最贵的钱是购置天价学区房，上千万的“老破小”，经常要靠抢才能锁定……家长疲于奔命地“自鸡”，倾其所有地“鸡娃”，到头来，真正“上岸”考入理想学校的孩子还是那个人数。

笔者曾想过一个问题，家长们不断前置“人生起跑线”的想法源头在哪里？想来想去，大概是“一代要比一代强”的这个执念作祟。的确，谁都希望自己的儿女拥有更强的能力、得到更幸福的人生。但这个想法本身就含有漏洞，孩子要比自己高，后代一代比一代高，那几代以后不就成了“巨人族”？有好的愿望无可厚非，但是执着于梦想成真，就不切实际了，到头来伤了自己，更伤了孩子。

也有很多家长“鸡娃”的心态据自己说很“佛系”——花钱买心安，孩子以后别埋怨，自己也不后悔；还有家长声称“三观皆正”——我自己努力，以身作则，有了快乐童年就没有幸福人生。于是，在这种彼此“激励”，互相“鼓励”下，“教育焦虑”成了社会流行病。还是举补课这个小例子，谈起课外辅导，走过来的人都认为作用不大；还在经历的人深感乱象丛生、不堪重负；即便是局外之人，也不胜其烦，希望能加大力度清理整顿。但事实上，大家交起这份“智商税”时，依然争先恐后，唯恐自己交晚了、交少了，耽误了孩子。

今年全国两会上，全国政协委员、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谈到：“好的教育应该是培养终生运动者、责任担当者、问题解决者和优雅生活者，给孩子们健全而优秀的人格，赢得未来的幸福，造福国家社会。今天孩子的全面素质就是国家未来的整体实力，也是我们社会的幸福程度。”在他看来，补课班报多了，只能破坏孩子的兴趣，没了兴趣又何谈学习？这番话在网上引起了热议。

好的教育应该是会让学生变成更好的自己。社会需要的不只是优秀的学生，更需要优秀的人。在日益多元的社会，一个人的能力远不是分数、证书可以量化的。如果我们只是将升学作为评判标准，那么我们传递给孩子的不只是难以自拔的焦虑，也让他们失去了本来的更多可能。换句话说，你今天交过的“智商税”，难道还要让孩子们长大后再交一次吗？

不过，说到底，家长们如此焦虑，是因为优质教育资源有限，以及不同区域教育发展不均衡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光我在这儿劝没用，还是要从源头入手，从教育资源的供给侧入手。

贵州清镇提升人才工作质量

本报讯 今年以来，贵州清镇市在全市范围内推行人才“四化”理念转化实践，促进人才工作动起来、统起来、干起来，以人才工作高质量不断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
该市紧盯人才“引进、培育、使用和服务”重要环节，切实解决人才“引不进、培不好、留不住”的问题。坚持“系统化推进”，把摸清人才资源底数、人才发展目标、制定人才政策等工作实行项目化、清单化管理推进，实现人才底数、目标、制策无缝对接落实，全链条、全视角、全方位提升人才质量。（姜敬）

安徽肥西经开区民生建设提速

本报讯 2021年，安徽肥西经开区将快马加鞭推进众多大建设项目，民生工程建设迎来大提速，大建设项目共48项，当年预计投资20亿元。

据悉，这些项目包括交通基础设施、生态环境综合整治、园林绿化、公用事业、安置房建设等工程项目，涵盖交通出行、民生服务、教育医疗、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等，将为当地民生发展提供有力保障。以正在扫尾的新港南区安置点B区工程为例，可提供住宅2885套，配建了一所36班容量的小学和一所12班容量的幼儿园，方便就近入学。（方杰 朱镇）



互联网信息服务终端软件捆绑其他软件现象多发，此类行为缺乏法律规范

软件“捆绑安装”，到底行不行？

是内置功能模块还是独立软件

2018年底，李强下载某杀毒软件后发现，其电脑桌面发现有“软件管家”“护眼大师”两款软件。李强认为，自己并没有下载这两款软件，这属于杀毒软件“捆绑安装”的软件。于是，李强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在一审庭审中，法庭主持当庭勘验，发现该杀毒软件下载完成后，桌面确实会自动生成“软件管家”快捷方式。杀毒软件主界面显示模块包括“软件管家”，点击后则弹出独立于原界面的独立界面，包含软件搜索、下载、升级、清理、卸载等功能。该杀毒软件中的“护眼模式”默认打开，点击该按键后弹出独立界面，包含“过滤蓝光”及“定时休息”两个功能。

此外，消费者在选择下载杀毒软件时，必须同步下载及安装“护眼模式”及“软件管家”，杀毒软件运营公司并未向消费者提供“仅使用反病毒软件”的选项，亦未事先以合理方式进告知及提示，因此侵犯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。

去年5月，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，要求杀毒软件运营公司赔付李强500元。一审判决后，杀毒软件运营公司提起上诉。不过，上诉期间，原被告双方在二审中达成调解协议。此后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二审判决，要求杀毒软件运营公司赔付李强700元。

现，还是产品实质功能来看，结合相应技术标准，“护眼模式”及“软件管家”均具备作为终端软件的独立性，而非杀毒软件的必要组成部分。因此，在该产品中内置“护眼模式”及“软件管家”功能构成“捆绑安装”软件行为。

此外，消费者在选择下载杀毒软件时，必须同步下载及安装“护眼模式”及“软件管家”，杀毒软件运营公司并未向消费者提供“仅使用反病毒软件”的选项，亦未事先以合理方式进告知及提示，因此侵犯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。

去年5月，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，要求杀毒软件运营公司赔付李强500元。一审判决后，杀毒软件运营公司提起上诉。不过，上诉期间，原被告双方在二审中达成调解协议。此后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二审判决，要求杀毒软件运营公司赔付李强700元。

对此，法院审理认为，无论是从外观表

现，还是产品实质功能来看，结合相应技术标准，对捆绑软件行为性质、法律后果作出认定的案例，尤其是以侵害消费者权益为裁判依据的案例，处于空白状态。

应当看到，不同软件产品的组合下载和安装，不仅有利于优化消费者的使用体验，还能促进软件运营商、甚至是互联网行业的整体发展。但也应看到，软件提供者如果未就捆绑软件尽到显著的提示和告知义务，未赋予消费者选择下载的权利和独立卸载的功能，则违背了消费者的真实意愿。”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法官周泉泉说。

在周泉泉看来，强制捆绑软件，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，还会发生擅自获取、泄漏消费者个人信息、篡改消费者电脑系统程序或文件等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情形。

“如果经营者在提供软件下载服务过程中采用了强制捆绑的方式，则构成对消费者法定权利即知情权及自主选择权的侵害，消费者可据此寻求法律救济，要求经营者依法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。”周泉泉说。

本报记者 杨召奎

上海消费者李强（化名）下载某杀毒软件之后，发现电脑里竟然有“软件管家”“护眼大师”两款软件。李强认为，自己并没有下载这两款软件，这属于杀毒软件“捆绑安装”的软件。于是，李强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2019年5月，该案入选中国消费者协会2019~2020年“全国消费维权十大典型案例”。

中消协专家委员会专家指出，经营者提供软件捆绑下载及安装服务时，如未尽到以合理方式事先提示和告知义务，未赋予消费者选择单独下载的权利和独立卸载的功能的，则构成对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侵害，依法应承担侵权责任。